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5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论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

冯立新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严复认为,"译事三难: 信、达、雅"。"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主要源于其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

关键词: 严复; 信、达、雅; 翻译标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5)02-0131-04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1866年,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经济、法律理论、进化论和逻辑学等新学说新思想,参观过英国议会、法院等制度设施,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严复所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时期,启蒙与救亡是中国近代两大主题。为挽救危亡的中国,他大量翻译了西方著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被人誉为"译界泰斗"[1]和"能熔中西为一冶"的第一人[2]1561。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信、达、雅"之翻译标准,对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1895年,严复开始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取名《天演论》。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 信、达、雅"。他引用孔子的话,"修辞立诚","辞达而已","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并指出,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2]1322。此翻译思想一出,即备受推崇,甚至被奉作翻译的"金科玉律"。

首先,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

所谓"信"是指要忠实于原文。翻译的过程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而译者正是沟通原作与译作之间的桥梁。基于对原作忠实的原则,翻译有从属性的一面,即在翻译时译文无论是思想内容、感情色彩,还是风格韵味都必须忠实于原作,这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译作在思想内容、表达方式、感情色彩与原作相去甚远,那就是不"信"了。正如钱钟书说的那样,翻译者无权改变原作的内容,也只能运用翻译的技巧,以稍稍自由的手法,来彻底表达原意,而构成正确的翻译。译者只能在原作作者通过原作所给定的范围内进行再创造,包括原作的内容、风格、文体等。只有翻译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忠实于原文,才能达到翻译的"与原文最接近的功能等值"的效果。作为译者首先要有较强的理论素养,能正确理解原作。只有理解原作,才能再现原作,这是"信"的基础。能做到这一点,严复认为"求其信已大难矣"。

收稿日期: 2005-01-18

作者简介: 冯立新(1970-),男,湖北大冶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翻译.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寻求相同的意义,将其中一种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在寻求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同义和等值,这是最基本的"信"。任何原作不仅存在表面的意思,还有用文字所表达出来的隐藏于文本之中的深层内涵,作为译者也要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读者,对读者做到诚实不欺,这是更深一个层次的"信"。这是严复所说的,"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2]1321。如果仅仅是忠实于文本表面意思,但不能流畅地表达原作深层意思,"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2]1321。

其次,"达"是翻译之目的。

严复所说的"达",不是指我们在翻译中的表达清楚,语言通畅,是"达旨"(达意)的"达",也就是表达原文的宗旨,即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有学者曾对严复的"达"作过中肯的评价,严氏所谓"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3]。

从理论上讲,翻译是一个信息转换和传递的过程,目的在于用译入语以最接近、最自然的方式从意义和风格两方面再现原文信息。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其语言文字表达必然不同,一个良好的译作必然是在本土中寻求最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原作意思。严复认为,中西语言文化有较大差别,"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百十言"[2]1321。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则要对原文形式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否则就会出现一些令人费解的词语。"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2]1321。只有对一些词句进行"删削取径",才能做到语言通顺。

通过对句法调整,使语言通顺是做到"达"的基础。"达"的更高层面是要表达原作的深层蕴意,这需要译者能对原作"取明深义"。所以这要求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2]1321。也就是说译者要对原作宗旨有深刻的领会,再以另一种符号表达出来。这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对翻译目的与手段关系之间的论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是将翻译作为交际结果进行研究的。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交际行为。在自然的交际活动中,语言主要是起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强调,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我觉得译者或译员都是画家,而不是摄影师。绘画是借助画家的看法,从要表现的现实中提炼与现实相当的意义和信息,翻译亦然,是要透过语言层次,深入到言语层面,理解文本或篇章的意义,以恰当的形式加以表达。"[4]

最后,"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

"雅"就是要注意修辞,富有文采。雅本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诸夏的话,也就是当时的官方语。《尔雅·序》题下疏曰:"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严复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如果用方言而不用雅言,由于其受地域制约,则会"行之不远"。他认为要做到"雅",对语体选择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2]1322。严复认为,"雅"是在信和达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译文语言本身的古朴典雅,以求传达原文的"精理微言"。

翻译首要的是叙述清楚、读来流畅、遣词造句有文采,使读者阅读后能得到极大的享受,这是翻译的最大成功。为达到"雅",严复对翻译中的文体十分注意,他总是喜爱用中国古文表达出来。严复为何选择以前的语体呢,这与他对中西语言文字的理解有关系。严复认为,西方国家"文白合一",是"语言合之文字"[5]。西方国家近世文章和以前相比,在思想和学术方面有所进步,但在感情表达上并没多大进步。中国古今文体差异较大,在古文学中,词汇丰富,表现手法多样,而且符合优美的标准。"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理想，状写美丽奇异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如沈隐候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他认为，在对“情”和“状”的表达上，古文远非白话文可比，“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5] 同时，严复对中国古文的推崇与他受到晚清桐城派的影响有关，他对桐城派的古文家吴汝纶十分尊重，认为他“既湛旧学，又乐闻新知”，“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所以他的译作多有桐城遗风[2]1550。用古文译出来的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韵味，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严译《天演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鲁迅先生认为，在严译名著中，“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幌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6]。鲁迅先生也觉得写得很好，竟一口气就将它读完。

二

严复提出“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距今已经 100 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傅斯年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7] 胡适则认为严复“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8]。周笃宝则认为，如果说严氏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之于“雅”[9]。而郭延礼则认为严复所译著作中，于信、达、雅的标准未能全部实现[10]。

作为近代会通中西的第一人，严复在其翻译实践中确实并没有完全做到“信、达、雅”，这与他的翻译动机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从翻译动机来看，严复的翻译西方著作是围绕“开民智”来进行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日弱，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渐受西方列强凌辱而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危亡之中国，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学习西方首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在战后出现了翻译西方军事技术的热潮。甲午一役的失败，使严复认识到治国之本，不在科学技术，“则是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其中则“又以民智为最急也”[11]。只有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对国民进行启蒙，开启民智才能做到自强保种。所以严复在翻译时一边是原作，另一边则是自己所加的按语。他翻译时，也不完全是根据忠实原作的“信”的标准来进行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4]1321。也就是说严复采用意译加按语的方式，为超越西学文本进行现实文化阐释打开了空间。严复的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为我所用的文化阐释，导致了严复对西学原著解读的合理偏差。西学文本的中国式解读很快就引起国人的关注，使“自强保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达到了严复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

从社会现实来看，尽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但中国守旧势力不可小视。要不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学习哪些东西，新旧思想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学习西方问题上，顽固守旧派人士强烈反对，理学大师倭仁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尽管后来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由于传统守旧势力的强大，他们也不得不将学习西学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如何使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能接受来自西洋的思想，则必须对原有文本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本土形式。“如果翻译在特定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寻求能够使译作为接受文化所接纳，不惜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以牺牲文本的原始形式,使译作适应接受文化现有的准则"[13]。严复认识到士为民风之本,要使国人了解西学,最关键的是要让官僚士绅阶层能认同西学。所以,他十分讲究译著的文体形式,他采用典雅的先秦文体,使之适合传统士大夫认知习惯。对此王佐良先生在 Two Early Translators Reconsidered 中有过精彩的评价,"雅"绝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追求完美",严复用汉以前的雅语译《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群学肄言》、《天演论》等著作,其目的在于在这些代表西方现代思想的苦药外面裹上一层古雅文体的糖衣,以使向来对外来事物抱深闭固拒态度的中国士大夫比较容易下咽。"雅"也者,实为严复的一种招徕之术。事实证明,严复"招徕之术"为中国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唤起了国人追慕西学扶危救亡的热情。

总之,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着意介绍西方先进思想方面功不可没。他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在历经百余年,经过多角度解释,也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赋予新的内涵之后,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流派为更多的翻译同仁所接纳。

参考文献:

[1] 胡汉民. 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J]. 民报,(2).
[2] 严 复. 严复集(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范存忠. 漫谈翻译.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78.
[4] 许 钧. 翻译释意理论辨——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J]. 中国翻译,1998,(1):10.
[5] 严 复. 严复集(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6:699.
[6] 鲁 迅. 鲁迅全集(四)[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75.
[7] 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1.
[8] 张志建. 严复学术思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195.
[9] 周笃宝. 继承传统译论,建立科学翻译学[J]. 中国翻译. 2000,2:29.
[10]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况[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47.
[11] 严 复. 严复集(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4.
[12] 冯桂芬.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84.
[13] 廖七一. 当代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67.

On Yan Fu's Translation Thought: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FENG Li-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CAU,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YanFu thought, "In translation there are three difficulties, namely,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Faithfulness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translation. Expressiveness is its purpose . Elegance is the choice of registers. Over 100 years, the three characters have being received with different views and judgements. But in his own translation Yan Fu did not obey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strictly mainly because of his motivation to strive for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western learning which is strongly repulsed by the bureaucrats and the scholar-official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Yanfu;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trnslation standard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